

中国新文学大系  
导言集



中国新文学大系  
续编导言集

(内部材料)

## 出版前言

当我们影印了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之后，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动机，希望能编一套《续编》和《三编》，因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，只是从一九一七——一九二七，是“中国新文学运动”第一个“十年”的总结；《续编》当是第二个“十年”（一九二八——一九三八），《三编》当是第三个“十年”（一九三八——一九四八），如果能如我们所愿，那末，中国“新文学运动”的历史大致完整了。

当我们想开始编《续编》的时候，第一个问题，资料那里去找？请谁来编？要编一套五六百万字的书，最少要有五六千万字的资料，这太困难了，资料在那里呢！有些地区的资料，不一定可以随便取用；有些地区的资料，可以应用，又恐怕不够；这些困难，不能想像，但是愈困难，想编印这套书的愿望，愈是强烈。后来只有“盲人骑瞎马”，到处乱找，海外朋友，也写信去问，这样搞了几个月，总算有点头绪，最后决定，分在三地——东京、新加坡、香港进行，于是开始汇集资料，选定每册的编者，资料集中寄港，加以整理后，再分寄三地编者编辑，编好后，陆续寄港排版，这工作我们前后做了四年之久，现在已经全部排好，总算松了一口气，本来每册编者姓名，应该分别刊出，以示郑重，但今时今地，似乎还是不刊为宜，但有一点可向读者交代的，所有编者都是国内外知名人物，对新文学有一定的造诣，读者

看了几篇《导言》，即可略知一二了。

现在已是出版前夕，我们最后再看一次校样，准备付印了，心中充满了兴奋和不安：兴奋的是，这件困难的工作，总算完全给克服了；不安的是很多选文的作者，都有着不同的际遇，和不同的环境，和四年前大不相同了，这是非我们所能预料的。

所以最后我们这样说，我们今日出版这套书，充满着勇气，也许算是为“中国新文学运动”第二个“十年”总结的整理工作，尽过一点力量，也是一些交代。至于《三编》的出版，能否如我们的愿望，那简直是不敢想像了。

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部

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出版前言 .....      | ( 1 )  |
| 总 序 .....       | ( 1 )  |
| 《文学论争集》导言 ..... | ( 36 ) |
| 附参考书目 .....     | (121)  |
| 附目录 .....       | (123)  |
| 《小说一集》导言 .....  | (129)  |
| 附目录 .....       | (165)  |
| 《小说二集》导言 .....  | (169)  |
| 附目录 .....       | (195)  |
| 《小说三集》导言 .....  | (198)  |
| 附目录 .....       | (227)  |
| 《散文一集》导言 .....  | (230)  |
| 附目录 .....       | (286)  |
| 《散文二集》导言 .....  | (294)  |
| 附目录 .....       | (320)  |
| 《散文三集》导言 .....  | (327)  |
| 附目录 .....       | (353)  |
| 《诗 集》导言 .....   | (360)  |
| 附目录 .....       | (436)  |
| 《戏剧集》导言 .....   | (447)  |
| 附目录 .....       | (493)  |
| 《电影集》导言 .....   | (495)  |
| 附目录 .....       | (544)  |

# 总 序

谭诗园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上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成果。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。它清楚地记录着许多文学先辈们，在经过与封建文学的许多艰苦搏斗之后，终于打碎其枷锁，以新文学取其正统地位而代之的过程。先辈们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明朗地照彻着整个文坛，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路向作出了宝贵的启示。

新文学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，由于参加者的出身及所受之教育，认识各有不同，自然各人的贡献就有大小，对于参加这神圣工作的目的或观点也就难免有不一致，因而使新文学运动发展到后来在力量上引起分化，出现了无可避免的困难。尽管如此，先辈们的基本出发点和奋斗精神，大体上还是一致的。

其中最重要之点，就是他们长期以来都是接受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陶冶，对近代欧美之科学文明也有相当的认识，而中国封建文化长期以来予人的毒害，他们也曾深受其苦。在这些因素下，加上他们良知上的自觉，从事新文化运动，传播新思想，这样，他们就将传统的优良文化精神带进新文学的领域，使新文学运动一开始，就能以我国数千年文化积累

下来的可贵传统作为其灵魂，以与时代共呼吸的精神作为其外貌，又以反对封建制度所庇护之一切黑暗势力而为行动的目标。由于这些因素，中国新文学才能奇迹一般，在短短的年月之中，取代封建文学盘踞数千年的地位。因此，先辈们所作的承先启后之贡献，是值得我们纪念和景仰的。

我们翻阅先辈们的著作，可以看到贯串于其中的主线，是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。从这一主线上溯，我们可以发现它数千年来即已潜藏于文学之中。原来中国文学三千多年的历史，就是以现实主义为其发展的主流。中国的文化自周代到鸦片战争这一长时期中，一直都是受着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复杂变化而推动着前进，同时又从外来民族的文化中，吸取其精华以丰富自己。就是在这两项重要客观条件下，中华民族曾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，文学家和艺术家。从文学方面来说，大量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，就是最具体的证明；例如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以及屈原、司马迁、陶潜、杜甫、李白、白居易、辛弃疾、关汉卿、王实甫、施耐庵、罗贯中、吴承恩、吴敬梓、曹雪芹等，还有其它丰富的民间文学，如汉魏乐府诗，敦煌的变文，宋元以来的平话小说，戏曲、鼓词、弹词、民歌、传说、地方戏等等，这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，都是各具其鲜明特色和现实主义精神的。这些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，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的传递而为新文学所继承和发展，使中国的新文学运动，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方向，并以现实主义为主流而获得迅速的发展。

在致力于建设现实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辈们当中，贡献最大的首先要数鲁迅。因为新文学运动展开以后不久，

当时几位重要的发起人、领导者，由于各人的思想不同，后来就改变了奋斗的目标。譬如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，后来就放下了文学而热心于政治宣传去了；又如曾不计一切牺牲而猛冲封建文化堡垒的钱玄同，不久也离开了新文学战线，回到故纸堆中去了；再如以《文学改良刍议》而著名的胡适，后来也抱着强调“一点一滴的解放，具体的问题，必要时的存疑和个人的独立思考”的实验主义态度整理国故去了。只有鲁迅，始终坚持着弃医从文的初衷，不计一切艰难劳苦，默默地从事着新文学播种耕耘的工作；从新文学运动开始，经过第一个十年，第二个十年以至离世时止，都没有稍为松懈过片刻。所以在文学界的先辈们当中，只有鲁迅留下的成果最为丰富，最为坚实。不止如此，他对后进的文学青年也是关怀备致，时加提携指导；对于培养文坛的新生力军常穷其精力，许多文学青年就是受到他的指引、帮助而走上了文学道路，成为出色的作家，对新文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。从这些方面来看，是没有任何一位与他同时代的文学家可与他相比的，所以他对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建设、发展，贡献最大，影响最深远！

至于醉心于宣扬、赞颂西方近代文明的胡适，他早期的活动和若干言论；如当炽热的革命思潮泛滥全国的时候，他却说该打倒的“是贫穷、是疾病、是愚昧、是贪污、是扰乱”，虽然这些都是该打倒的不合理现象，但与当时广大民众的激烈的、更彻底的要求是有着相当的距离；他甚至还主张“自觉的改革”，这自然是他天真的幻想，更甚者就是他劝告青年们“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‘主义’！”……由于这些不很适应于现实的思想，引起许多论者对他作严厉的批评，



甚至对他所曾致力过的文学工作的若干方面作完全否定者，也大有人在。尤其是晚年时，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长，以这样重要的地位，在一些国际性的集会上，发表贬抑、侮蔑中国文化和民族的言论，这自然更是招至各方面的反对和指责。虽然如此，他早期参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若干努力，比如从形式上着眼去鼓吹文体的解放，为当时文学的动向而提出过“八事”，以《尝试集》去尝试、提倡白话诗的创作；虽然不彻底，但到底也曾参加攻击“腐败家庭”、“死板板”的法律、迷信、旧道德、政客以及“孔家店”等等，从上述各方面来说，他虽然不是创始者或先行者，但不可否认的，这也总算是他对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作过努力，而且数十年来也为不少人所接受，有着他的同路人及追随者，因而也有着相当的影响。较为显见的事实是，对于古典文学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等名著的研究态度和观点，受胡适的见解所影响的颇多。如今，胡适已作古了，对于他在中国新文学方面的活动，是功是罪，研究者们可根据个人的观点，赞扬或贬抑尽管各自由之，但客观存在着的事实，我们是应该承认的。

文学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，首要的条件是在于它能与时代的脚步一致，能适应当时社会大众的共同要求。第一个“十年”时期，当时社会大众的总的要求是反对封建制度，粉碎一切不合理的黑暗现象，当时的文学作品，就是充满鲜明的反对封建制度的精神。虽然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过，作家们所受的教养各有不同，思想认识有深浅之别；他们的作品中，所表现的积极性就有着不同程度的分别。

以诗歌来说，胡适的《尝试集》，以我们现代的眼光来鉴别，自然觉得它很幼稚。但是在当时因诗词的形式和格律，还普遍是一般人心中不可变更的“金科玉律”时，他敢于作这种“离经叛道”的“尝试”，这到底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胡适在《尝试集》中所能作到的，虽还只限于形式上，很少接触到诗所需要之内容上的革新，但他能不为传统、因袭观念所束缚，这也显示出了在冲破封建文学的形式方面，他着实具有挑战者的勇敢精神。当然，刘半农对新诗的贡献，不论是形式或内容，都大大超越了胡适，不过，他的第一本诗集《扬鞭集》的出版时间（一九二六年），比之《尝试集》已晚了六年。从时间或个人文学修养的进度上来说，这正是必然的现象，从这里也可见出文学发展的一点痕迹。

接续出现的诗人们，他们的吟咏中也时常传达出受苦者的声息，很少述说个人的哀怨寂寞，虽然有些人较为偏爱自然风物的描绘，如康白情的《草儿在前集》，俞平伯的《冬夜》、《西还》等，其中也表现着人与大自然和谐的感情，引起人们对自然的怀恋。

在反对封建及社会黑暗势力方面，以小说的表现最为积极，其中又以鲁迅的小说最为深刻有力，最能体现出中国文学中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。如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自白，暴露出数千年来的社会中人吃人的悲惨事实的《狂人日记》，其主题思想就与“五四”时期所提出的反对“吃人礼教”口号的精神十分一致。又如在《孔乙己》中，同样也深刻的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，从主人公孔乙己的悲惨遭遇，令人看到封建社会的冷酷无情，以及像丁举人那一类人的行径之可恶。

此外，鲁迅又藉着《故乡》与《阿Q正传》等杰作，带引知识界的视野扩展到农村去，使人同时看到长久以来存在于农村中的严重问题。我们看到勤劳、朴实的闰土，他为贫困的生活折磨得毫无朝气，阴郁地过着日子。他可以说是中国古老农村中的典型人物，他的精神状态也是那时一般农民所共有的。至于闻名中外的阿Q，可以说，鲁迅是把中国各个阶层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弱点，都集于阿Q身上，但表现得更多的是农村中的赤贫者的浮浪性格，要我们正视其缺点，从而勇敢地将深藏于我们灵魂深处的一切弱点洗涤掉。

其他小说家如汪敬熙、杨振声、叶绍钧、许钦文、王鲁彦等，也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而勇敢地探索着人生的问题。

在戏剧方面，对理论的探讨较为热烈，其中又较为偏于对中国旧剧的否定；另外是对西洋戏剧的介绍，这方面以介绍反传统和因袭思想的剧作为主，如易卜生的作品；因为这与当时反对旧礼教，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相适应的。至于创作方面，因为不易摆脱和旧剧文学的影响，取材于历史的剧作占较为重要的地位，但其题材意义却仍旧是配合现实的需要，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反封建的作用。其他取材于现实人生的剧作，技巧虽未成熟，说教的意味也较浓，但对社会人生，特别是恋爱自由问题所作的探讨，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上述文学创作精神的倾向，我们可于许多优秀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中看到。因此，也可以印证古今文学中现实主义精神上存在着血肉相连的关系。

中国新文学的发展，到了第二个“十年”时期，社会处于长期的动乱之中，军阀混战割据，内战，加上日本的侵略，使广大民众陷于惊惶不安的境地。而黑暗势力，直接加于文学的压力、阻碍，又日甚一日。文艺工作者们在罪恶势力所张的黑网笼罩下，随时有失去自由，甚至失去性命的危险，稍为有正义感的文学期刊、作品集，都难有立足的机会。总之，中国文学是处于空前的苦难时代，但没有为黑暗势力所窒息，相反的，循着迂回曲折的道路，它获得更坚实、更壮大的发展。

时代愈艰难，文学也愈能于发展中显出其与民众共呼吸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纯度，这正是中国文学宝贵的传统之一，这种传统，正是为本时期的文学所继承着，发展着！

这时期的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一方面忙于应付黑暗势力的挑战和迫害，同时也还得与文学界本身存在着的异己者战斗。在文学理论方面所见的现象尤其复杂，多次的争论，就是不断战斗的一个方面。每一次论战的结果，都使文学理论向前推进一步。

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，因谁是革命文学倡导者的问题，互相攻击，但另一方面又因普罗文艺问题，对鲁迅和茅盾展开攻击，特别是对鲁迅，更是超越了对问题论辩的程度而偏向于人身攻击，画室曾指出：“一大本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”，由此可见创造社等当时的态度多么蛮横。由于这次论战，间接予中国文学很大的好处，因为受了创造社的“挤”，鲁迅“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，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，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。”并且把一些文艺理论译介过来，为读者们较为有系统的介绍了一

些外国的科学文艺理论，而为左联的成立和工作实践准备了理论的基础。

为革命文学问题受到攻击，鲁迅和茅盾所作的辩护，他们的意见都是能促进新文学的发展，而不是革命文学的敌人。经过这一场论战，双方都对许多问题获得深入的、明确的理解，文学战线上所存在着的敌友问题，也得到了澄清。

一九三〇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是文艺工作者广泛团结的表现。该组织的工作方针包括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，扩大文艺运动，建立种种研究的组织；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，及提拔工农作家；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家等等。鲁迅在大会上发表了《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的演说，这是一篇富有历史意义的文件，他指出左联应注意这些事项：“第一，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，必须坚决，持久不断。旧社会的根底原是非常坚固的，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。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，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。”第二是“战线应该扩大”。第三是“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”。第四是“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”。

左联存在的时间只有六年，但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。譬如当日寇的侵略最猖狂的时刻，左联组织大量的文艺工作者投入抗日运动中去，以及发动不少作家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，对抗击日寇起过很大的作用。在文艺理论方面，有计划有组织地把外国先进的文学理论介绍过来；又曾对新月派、民族主义文学、第三种人文学等不同立场的文学进行论战，推广了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和影响。对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，曾经作过很大的努力。尤其是对于新作

家的培养，成绩更为可观。

左联的一切活动，主要是在鲁迅的领导下进行。尤其是在笔战方面，鲁迅横扫论敌，处处显出他的闯将本色来。当在联成立后的三个月，一部分作家如王平陵、朱应鹏、黄震遐等，举起民族主义文艺的旗帜向左联挑战，鲁迅当即拿他们的本质剖析，并示众一番，指出他们“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，永含着恋主的哀愁，”等到改革的“风涛怒吼起来，刷洗山河的时候，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命运。”这个流派果然很快就销声匿迹了。

一九三二年，胡秋原和苏汶向左联“要”文艺“自由”，引起一场“文艺自由”的辩论。他们两人在许多篇唱和的文章中，共同强调文艺可以脱离政治、脱离阶级而自由，可以不替阶级服务，不做阶级的武器。同声反对政治干涉文艺，认为属于“第三种人”的作家都搁了笔，是因为受了左联批评、干涉的缘故。他们又反对左联提倡文学大众化，说左联“左而不作”。他们的结论认为“第三种人”未必做得成，第三种文学却是可以成立的。

对于这种文艺理论，鲁迅、瞿秋白、周起应、冯雪峰等都曾提出批评，但以鲁迅的《论“第三种人”》一文最为精辟，他指出：“这‘第三种人’的‘搁笔’，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。真实原因的所在，是在做不成这样的‘第三种人’，做不成这样的人，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，搁与不搁，还谈不到。”“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，生在战斗的时代要离开战斗而独立，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，这样的人，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，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。”至于苏汶所攻击的“连环图画和唱本”，

鲁迅答复道：“我相信，从唱本和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、弗罗培尔的。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，谁也没有非议了，但实际上，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，《旧约》的连环图画么？而且是为了那时的‘现在’的。”

事隔数十年，历史已证明了胡秋原和苏汶的理论是与现实要求脱节的。这次辩论，使左联内部清算了一些左倾机械论以及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，使以后的发展更为坚实有力。

在对外的笔战方面，左联的组织力表现得很好；但内部对于一些理论，却不是没有歧见的。如关于大众化问题，大众语文问题等，左联就曾展开热烈的辩论。

关于大众化问题，创造社于提倡革命文学时期，已经接触过，不过当时没有得到解决，这个问题，到了左联时期，一开始就将之作为文艺运动的中心而展开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行委员会就曾关于“大众化问题的意义”提出决议，指出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时说：“首先是第一个重大的问题，就是文学大众化。”“而尤在此问题之解决实为完成一切新任务所必要的道路”。强调“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”。

因为大众化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，它与其他问题都有关系，其中最主要的是“用什么话写”。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自由辩论时，宋阳和止敬曾略为接触过，但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。到一九三四年因了反对“文言复兴”，这问题才得到进一步的讨论。

由于反对文言复兴的讨论，引出了大众语的建立和应用问题，讨论下去，就接触到汉字的繁难，这是大众语的障碍，更是文学大众化的根本障碍。这个问题不能彻底解决，文学

就难真正做到全面的大众化。要解决这一问题，自然要讨论到汉字的存废，而代以拉丁化新文字的问题。这正如鲁迅所指出：“和提倡文言文的倒车相反，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，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：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。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，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。”

所谓文学大众化，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的普及问题，而语言文字就是形式的中心，无疑是要先接触到的。作为整个“文艺大众化”的问题，除了语言之外自然还有其他问题，例如鲁迅在《论旧形式的利用》一文中，就曾把“旧形式之批判的利用”作为解决大众文艺形式的途径之一；但大众化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为工农的意思，这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的基本方向。

左联的成立，虽然团结了不少作家，但在文艺工作者之中，也有不少观点和立场不同的，他们就没有应召站到旗下来，一直都游离于左翼作家联盟之外；后来因为日本的加紧侵略，这群文艺工作者之中的一部分，已感到形势迫人，不团结势无以自救，因此也就有了抗拒侵略的要求。后来左联提出一切文学工作者结成统一战线，共同抗日，于是原来在左联以外的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响应号召，纷纷加盟，汇成一股浩荡的抗日巨流。

但关于用什么口号作为行动的标帜？这却引起过一番争论。首先由周扬等提出“国防文学”，继而又由鲁迅和胡风等提出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，许多笔墨就在这两个口号之争中消耗了。

其实，这两个口号孰长孰短，似乎是形式上的问题，实际的意义，固然主要是一种文学方针的讨论，但不可否认的也



涉及到宗派主义方面。所以在文学统一战线进行之初，有一部分人发起了中国文艺家协会，另一部分又发表了一篇《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》。这样一来，本来是为要抵抗侵略才提出大联合的要求，反而因此形成了新的对立局面。

然而，由于现实情势的发展和要求，也因为文艺工作者们一致努力，终于克服了宗派主义的影响，由文艺界各方面的主要人物联合发表了一篇《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》，对立的局面才告结束，文学运动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才奠定；到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，才是这次因抗日大联合形式上的完成。

从上面简单的叙述，我们大致上可看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。也意识到每一步的发展，都是由于时代的要求；不过因为文艺工作者们有着思想认识深浅之别，使文艺界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进步与落后的现象，但在现实的影响下，总能导至某些作家与时代之间的矛盾消除，克服困难，担负起时代所付托之使命。这也可以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。而中国新文学，就是沿着这规律而发展的。

### 三

时代飞跃的发展，促成了第二个“十年”时期的新诗，同其他的新文学形式，有着急激的竞相发展。继承着上一时期所特有的反封建精神，新诗在这第二个“十年”时期中所表现的更为强烈。

第二个“十年”时期的大主题是在表现抗日、反侵略以及反封建，大时代付托诗人们的任务比前更艰巨，也因此显出诗人们的精神更焕发。